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费尔巴哈人本观的扬弃与超越

张家佳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0日

摘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理论研究中, 学界长期存在“人本主义”与“科学唯物主义”的对立解读。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出发, 可以跳出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 揭示马克思如何在沿用费尔巴哈“类本质”“对象性”等术语的同时, 为其注入关系性维度的全新内核。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揭示了生产领域人的存在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异化, 又以交往异化理论阐释了流通领域的物化关系, 二者共同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这一超越将批判的根基从抽象本质转向现实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 使《手稿》成为从“感性直观”走向“对象性活动”的哲学革命转折点, 为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 异化劳动, 交往异化, 历史唯物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The Subl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View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Jiajia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6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alienation theor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there

文章引用: 张家佳.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费尔巴哈人本观的扬弃与超越[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42-48.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56

has long been an opposing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umanism” and “scientific materialism”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e activity”, we can break out of this binary framework of either or and reveal how Marx injected a new core of relational dimension into Feuerbach while using terms such as “class essence” and “objectivity”. Marx revealed the mod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production field in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explained the materializ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circulation field through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Together, they completed the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s humanism. This transcendence shifts the foundation of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essence to realistic 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making the Manuscript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ary turning point from “sensory intuition” to “objective activity”, providing a new interpretive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early idea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 Alienated Labor,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界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性质的争论,核心在于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一种解读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为理论支点,认为《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另一种解读则强调《手稿》的哲学革命意义,如郭国勋指出《手稿》并非“两种逻辑的对立”,而是“以经济事实为基础,竭力实现人本分析与经济分析的有机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已从“实践”或“活动”视角切入这一问题,但其定位与本文存在关键差异。张义修通过概念史考察指出,《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仍“服务于人本学的哲学逻辑建构”,其核心内涵要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发生根本转变。赵家祥则将“对象性活动”阐释为实践的多重规定,但侧重于实践观本身的理论内涵。唐正东则论证,马克思异化论的方法论基础“不是建立在单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基始性的主体际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以动态性的劳动活动为核心内容的”。张一兵进一步区分了《穆勒笔记》中“交往异化”与《手稿》中“劳动异化”的理论层次,指出前者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历史过渡”。

本文进一步将“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作为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揭示二者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双重超越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意义。本文以“对象性活动”为贯穿性线索,统摄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的双重批判,论证《手稿》如何在沿用费尔巴哈术语的同时完成对其人本主义内核的根本置换,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哲学根基。

2. “异化理论”人本主义解读范式的形成与局限

“人的问题”的哲学探索,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中得以充分展现,其“类本质”概念并非毫无建树。他将哲学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拉回到感性存在的人本身,这一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解放意义。在费尔巴哈看来,“类”不是抽象的思辨概念,而是通过“感性”得到确证的现实关系。人通过感官与对象发生联系,在爱、友谊等感性关系中确证自己的类存在。他甚至试图从“我与你的关系”出发来理解

人的本质，这已经触及了主体间性维度的雏形。然而，费尔巴哈的“感性”始终停留在直观层面：他所说的“感性”是感性的存在，而非感性的活动；他所说的“类关系”是意识性的情感纽带，而非物质性的社会关系。正因为缺乏“活动”原则，他的“类本质”最终未能摆脱抽象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推进“对象性活动”原则的理论起点。

2.1. “孤立抽象的人”：类本质的非历史性

费尔巴哈作为这场争议的核心参照，其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对人的历史生成及所处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缺乏感性的物质内容，仅仅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撇去个体差异性的抽象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1]。将《手稿》的异化理论归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解读，主要依托于术语的相似性和结构的类比性，这种解释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混淆了哲学术语与哲学原则的界限。要澄清这一问题，必须深入剖析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人的“类本质”被视为既定的、静止的、抽象的自然共性。费尔巴哈明确宣称类的自我实现是“交媾行为”，只有通过性本能，如爱情、家庭才存在。这种从生物学意义上对“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撇去个体差异性的“理性、意志、爱”的“一”。他主张“自然的人”及其自然特质才是真实的，人不过是自然界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由这种自然特质所衍生出的“类关系”也只能是抽象普遍和概念的东西。诚然，费尔巴哈在论述类本质时也试图从关系性的角度加以理解。在他看来，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不是孤立地内在于个体之中，而是在它与对象的关系中通过它实现自身的类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2]。可见，连费尔巴哈都知道从关系态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难道受其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会在《手稿》中以孤立人的逻辑而落后于费尔巴哈本身吗[3]？费尔巴哈对类本质的阐释之所以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根本原因在于他未能把握类关系的物质性维度，其“类关系”也只是人们在爱情、友谊、道德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性关系。只要停留在感性存在的理论层面，他所揭示的“类生活”就必然沦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这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无本质区别。

2.2. 主客二分的异化思想：抽象的批判理论

费尔巴哈的异化批判理论只是一种抽象的批判理论。在他看来，人把自己最本质的东西奉献给了上帝，上帝因此变得全知、全能、博爱；而人自身却变得一无所有，反过来受制于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显然，这并不是从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正如他所说“把统治者本人跟我自己等量齐观，只要我理解他是像每个别人一样的人，那么，他的一切威严也就立时消失了”。换言之，他将人的类活动的内容局限于意识之中，对人的理解最终陷入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之中。

由这种抽象思辨的异化理论所导向的扬弃路径，也必然是抽象而无法实现的。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内嵌着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结构，即先验地设定未经异化的本真状态，以此为尺度去评判现实中的异化程度，最终回到原来的本真状态，因而主张“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类学”[4]。问题在于，这种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把任何事物都抽象掉了，因为整个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创造的产物，费尔巴哈通过对神的否定来设定人的存在，这实际上是非实在性的否定。因此，费尔巴哈是从人的某种属性考察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也被他寄托于直观的对象性形式，如男人与女人、我与你的关系之中，成为一种非历史性的抽象规定，感性个体无法通过实践真正把握它。

2.3. 术语借用与逻辑同构：人本主义解读的核心依据

学界关于青年马克思是人本主义的判断，主要指向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对费尔巴哈术语的借用与扬弃逻辑的同构。其一，术语相似性，认为马克思沿用“类本质”“对象性”“异化”等人本主义的核心词

汇；其二，逻辑同构性，将马克思的批判解读为“人的本质－异化－复归”的线性逻辑，与费尔巴哈的人本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别无二致。异化劳动被理解为抽象“类本质”与现实生产背离的价值悬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成为针对人的存在与本质相分离的伦理控诉。

这种解读范式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哲学术语与哲学原则的界限，未将马克思的哲学范畴置于对物质利益的关切、法哲学批判与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整体背景中。法哲学的批判引导马克思聚焦于剖析市民社会，而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研究，则推动他借助国民经济学批判展开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的深度解剖。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设定看似有人道主义特征，但其基础是生成论的历史逻辑。也就是说，他没有将人的本质预设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规定，而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被创造、被生成的过程。正如俞吾金所说，“决不能在纯粹哲学的范围内来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化”[5]。因此，《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与其说给出了一个关于“人是什么”的答案，不如说指明了“如何理解人”的方向。答案不在思辨之中，而在现实的人及其实际活动之中。正是基于这一路径，马克思后来在界定人的存在方式时明确指出：“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 p. 520)

同时，马克思并非从道德理想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入手，使异化批判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的批判融为一体。正是将理论置于资本主义历史事实中，这一批判便不再停留于道德批判层面，而是具有历史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以私有财产扬弃为中介的共产主义有其历史界限，它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而只是人的解放历程中的必经阶段。那种“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推论”[7]。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理解为精神返回自身的肯定过程，而马克思则把它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扬弃异化、走向解放的历史过程。对黑格尔而言，终点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对马克思而言，终点不是终点，而是消灭异化的现实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的异化劳动分析中，更是深入到流通领域中批判性考察人与人之间交往异化。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推进到“交往异化”问题，揭示了货币、信贷如何使人际交往沦为物化关系。然而，这一分析并非独立于异化劳动理论之外的新发现，而是异化劳动逻辑在流通领域的必然延伸。

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从“感性直观”到“对象性活动”

费尔巴哈止步于“感性直观”，而马克思则推进到“对象性活动”，这是《手稿》实现哲学革命的标志之一。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与交往异化理论，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先验预设，将其理解为在对象性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原则，马克思将批判的根基从哲学思辨提升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将早期马克思视为人本主义者，是因为未能洞察马克思逐步形成的重要认识，即“生产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8]，以及他从“劳动”的视角来把握人与社会不断生成的历史进程。

3.1. 人与产品的异化：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反过来统治人本身

劳动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将本质力量外化于产品，这是人确证自身的基本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愈多则劳动者愈贫困，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着生产者。学者望月清司认为，这一规定所设定的“人”是孤立的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是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的结果。但马克思明确工人受到自己“产品即资本”[9]的统治，这并非抽象的人与物的对立，而是现实的生产关系本身。

而要追问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何以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自《论犹太人问题》开始，马克思理解“人”是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个人，将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只有“需要和私人利益”，在交往中将他人视为“工具”。“工具”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只是它采取了异化、物化的形式。马克思揭示了这种工具化关

系背后人的社会联系，在此基础上批判市民社会的人的异化，进而提出人的解放“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6], p. 46)。《手稿》深化了这一认识：“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6], p. 170)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本质是工人与资本的关系。“工人”这一身份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私有财产关系中生成的，其劳动产品的异化，正是对象性活动在私有制条件下自我否定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将异化批判从抽象的哲学思辨推进到现实经济结构的分析，换言之，人的生存状况不是由某种先验本质的偏离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处的经济结构塑造的。

3.2. 劳动活动的异化：“对象性活动”本身的自我否定

人同劳动活动相异化，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从结果到过程的深化。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而是属于别人，成为丧失自身的手段。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中“别人”是对私有财产关系的先验预设，并主张以“私人所有占统治地位”来化解这一缺陷。但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出发，“别人”并非逻辑上的“突兀矛盾”。

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人只能通过“对象性活动”与对象之间产生“对象性关系”。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其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然。人以社会性的方式展开对象性活动，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属人的世界，建立起“为人的关系”。但如果这种关系“变成国民经济学‘为物(财富)的关系’，就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异化问题”[10]。也就是说，人所具有的特殊的生命特性使之创造出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而非感性直观的静态产物。面对国民经济学的既定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它不是劳动的前提，而是劳动在一定条件下展开的产物。由此看来，“别人”并非逻辑上的“突兀矛盾”，而是作为支配工人劳动的那种异己力量的人格化存在。这个人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6], p. 165)。换言之，它不是先验预设的实体，而是对象性活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社会力量。脱离社会关系谈劳动异化，只能将劳动抽象为生理活动，无法解释劳动为何会成为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至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层层揭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得以呈现。

3.3. 类本质异化：对象性活动从“自由自觉”沦为“谋生手段”

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是异化劳动的深层规定，也是学界人本主义解读的核心依据。但马克思虽借用其术语，却赋予其全新的内涵。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爱”的抽象统一，而马克思则将人的类本质锚定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正是对象性活动的本质规定。首先是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改造。费尔巴哈将“人与自然的统一”建立在直观原则上，其视野中的“自然”是与人无关的先在存在，“人”是被抽象化的“自然人”。而马克思则将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它既是人的活动对象，又在人的活动中被不断改造。人正是通过有意识地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需要，人与自然相互生成，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得以真正实现。

当对象性活动以异化的形式出现时，“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沦为“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不再通过劳动确证自身，反而在劳动中否定自身。更为关键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6], p. 184)，人的任何自我异化表现为“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6], p. 165)。这意味着，类本质的异化不是孤立个体的自我疏离，而是对象性活动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扭曲。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只考察“劳动时的劳动者”的批判，实质上同时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类本质”的超越。此外，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类活动”，不仅包含物质生产实践，更延伸到法律、国家、艺术等上层建筑。对“类本质”的把握，本身就蕴含着人的社会性。

3.4. 异化的对象性活动生成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

“人同人相异化”既是前三者之结果，也明确将异化置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有学者主张将“人与人相异化”设定为“两个私有者”[11]之间的对等主体的异化，否则在逻辑上无法回答“资本”作为积累和储存他人劳动的命题。然而，这一设定不仅重蹈国民经济学“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12], p. 25)的历史遮蔽，也缩小了异化所覆盖的广泛社会群体。马克思明确阐述私有财产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6], p. 168)异化远不限于私有者之间，而是贯穿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中。若将“人”简单理解为私有者，可以推断出无产阶级因一无所有而成为非异化群体的荒谬结论。

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出发，人与人的关系本应是对象性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人在对象活动中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关系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并以对自身的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具体表现为工人生产出支配自己劳动的资本家，资本家也生产出被自己支配的工人。二者是同一对象性活动的两级。因此，人与人相异化的本质，是对象性活动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全面扭曲。而异化得以实现的手段本身是实践的，其扬弃也必须诉诸现实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6], p. 185)，这种扬弃并非费尔巴哈式非历史性的抽象本质复归，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活动关系”基础上的历史生成。

3.5. 从生产到流通：交往异化揭示异化的“普遍性”

如果说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那么交往异化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对立如何泛化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普遍物化逻辑。在《穆勒笔记》中，他阐明交往异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往关系，因受到货币、信贷等物质力量的掌控，而呈现出不自由的状态。

货币本是人与人之间产品交换的中介，在私有制下却成为“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12], p. 20)，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直接交往变成了以货币为中介的物与物之间的抽象交换。信贷关系进一步使人本身沦为货币的化身。在信贷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自身的道德、信用被量化、被交换。这意味着资本家同样不是货币的主人，而是货币的“人格化身”。人的道德成为可交换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2], p. 22)。这不仅只是工人的处境，而是包括资本家在内所有人的困境。最后，交往异化最终导致人的交往与类活动、类精神相异化。不论是人自身在活动中的交换，还是产品的交换，类活动和类精神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6], p. 187)。但在私有制下，个体间的交往活动形成的类精神与社会关系也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由此，交往异化彻底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不是某个阶级的“不幸”，而是整个社会结构使人处于“非人”的状态。资本家看似拥有财富，实则被资本逻辑支配；小生产者看似独立，实则被交换价值裹挟。异化因此从“阶级批判”上升为“总体性社会批判”。

需要强调的是，话语体系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断裂。交往异化理论从人与人的交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本质。其根源还是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12], p. 25)，谋生劳动是交往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谋生的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与自身的需要、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其意义仅仅是维持生存，导致劳动“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12], p. 28)。这种劳动正是《手稿》中异化劳动的现实体现。当劳动沦为谋生的手段，劳动者就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生活资料，更决定了个体间必须进行物物交换才能生存。由此可见，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它们揭示了在私有制和商品交换所规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生命活动不得不以异化的方式呈现。可见，马克思不仅把物质生产实践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始终从具

体历史进程中的交往方式出发加以考察。这一分析路径虽然尚未使用“生产关系”等成熟术语，但已经蕴含着“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核心思想，并初步揭示了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费尔巴哈停留于生理活动的实践观判然有别。

4. 结语

依循思想史逻辑来探寻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来源之意义在于，既能客观全面地厘清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具体指向，又能深入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历程与影响，从整体性特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由此，《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不仅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更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43.
- [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文集(第 10 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75.
- [3] 唐正东.《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准确内容及其思想史地位[J]. 现代哲学, 2008(4): 7-14.
- [4]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122.
- [5]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6, 48(1): 65-74.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0, 46, 170, 165, 162, 184, 165, 168, 185, 187.
- [7] 隽鸿飞. 论异化劳动理论的双重逻辑及其思想史意义[J]. 理论探讨, 2022(4): 128-133+2.
- [8] 张一兵. 马克思: 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穆勒笔记》再研究[J]. 河北学刊, 2022, 42(3): 42-52.
- [9]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2.
- [10] 丁立卿, 胡海波. 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革命——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种研究[J]. 新视野, 2007(3): 72-74.
- [11] 韩立新. 《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79.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5, 20, 22, 25, 28.